

戴笠將軍與我

張季春

——憶往事·念雨公

創設蒙旗師範班

民國十五年七月北伐的號角，震破了籠罩中國的陰影，給中華民族開啓了新運。在廣闊的社會裏，到處流露着新精神，表現出新氣象，充滿了新希望。當時的我——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感受了時代強烈的光和熱，也銳意要做一個革命的新人，內心裏充滿着犧牲、貢獻的激情，燃燒着革命、奮鬥的火焰，充分顯示着那一個時代青年之特點。隨着北伐之勝利而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從江南擴展到塞北不久的時候，我抱着無比的熱忱，充滿信心的接任了張家口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的職務，立下「百年樹人，教育建國」的宏願，展開了艱辛草創的工作。

察哈爾省的建置，不論在地理風土和居民種族上，都有它十分明顯的特點。就前者而言，長城以北，土地荒曠，是一片廣大的草原，雖然也建有縣治，但主要的是盟旗地方；長城以南，則是原屬直隸省（後改稱河北省）口北道屬的十縣，而為一多山地帶。就後者而言，北部居民以蒙族為主，南部居民多是漢族，漢蒙之間，不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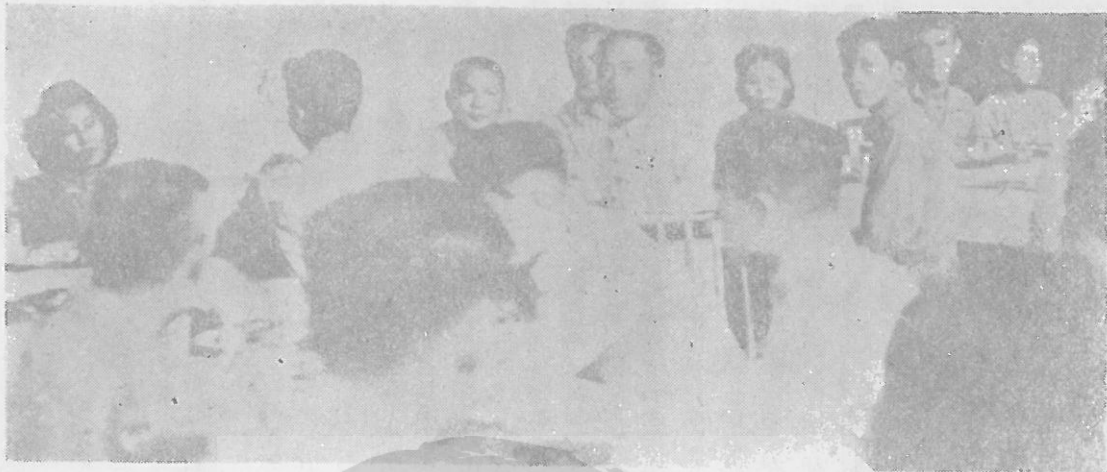
地域、風習、語文、生活諸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以致在心理上、感情上，不免有相當的隔閡。這對於省政建設和文化發展，均成為相當不利的因素。對於我們的國家，特別是國家的邊疆問題，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那時深深地看到了此一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決心貢獻自己的力量，來為察省、為國家，作一點長遠圖治的根本工作——我要把黨的宣傳、組訓工作，和國家的教育工作，密切的結合在一起，把重大的希望和責任，寄託於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人的身上，但是我披荆斬棘的為他們開路和奠基。

首先在民國十九年，我衝破了不少阻礙和困難，在我所主持校政的師範學校內，設立了蒙旗師範班，由各盟旗保送優秀青年子弟入學，接受按國家教育制度所進行的中等教育。從歷史上講，這是蒙族的中國青年與漢族的中國青年第一次的大會合，是蒙漢青年第一次共同的、平等的接受國家的教育；是中國青年第一次不分種族的學習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團結在一起，這中間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和作用。而這些蒙旗青年，歷年畢業後，都回蒙旗，分別在教育、軍事、政治和黨

務方面任職，後來發生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民國二十年，國民黨中央讚許和支持我所進行的工作，派我兼任察哈爾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當然，這首先是由於察哈爾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重視和贊助我所進行的工作，而在民國十九年冬，派我兼任察哈爾省會張家口黨務指導委員，引起中央的注意和考察，於是給我以更大的鼓勵，派我指導全省的黨務，加重了我的責任，也便利了我工作上更多的開展。使我的工作熱情，雲湧奮發，信心更加堅定，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全省的進步人士和青年，都親切的和我站在一起，而察哈爾省政府，也給予我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民國二十二年春，我的好友張志端（景方）給我介紹一位很特別的朋友，那就是性情豪爽而心又精細的王雨人同志。他是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這是戴雨農先生當時負責的特工單位——派在平綏線的「交通」。張景方請我無條件的給予王雨人全力的幫助和便利，我基於革命的道義，愛國的熱誠，立即慷慨的答應。兩人對我的豪爽、熱忱和義氣，十分欽服，此後一直表示他念念不忘的感佩。這奠定了與戴先生所領導的組織與



戴笠將軍與抗日情報工作同志會談時的情景

工作，建立了良好而深切的關係基礎，但也影響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大部分的命運，這誠然是一項重要的際會。

協助特務處工作

這一年的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方振武在察哈爾省發動了「同盟軍」事變，反對中央。省內許多進步的、正義人士，被迫逃避到他鄉，我和許多同志到了北平，並在北平設立了察哈爾省黨務臨時辦事處。在北平經雨人和景方的介紹，認識了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簡稱軍分會）供職的江雄風先生，並經他轉介，結識了軍分會的科長——鄭介民先生。鄭先生極誠懇的請我幫助他們，開展平綏線，特別是以張家口為重點的察哈爾省的地下工作。當時我和在北平的一些熱心而有血性的察省青年同志，確實盡力的給與他極大的幫助。

這一年的秋天，「同盟軍」事變結束了。我又回到察省，復任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和省黨務特派員。這時戴先生派高榮（子欣）任張家口工作站站長，並請我給他以適當的掩護和照顧。高同志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的，我即請他到第一師範學校擔任軍訓教官，這對他來說，確是一項十分妥適的掩護職業。繼而高子欣又銜戴先生之命，介紹許守素（揆一）同志前來，我又聘他到一師任公民教員。不久馬漢三同志擔任了張家口站站長，許揆一擔任書記，這時張家口工作站的工作領域，實際上除了張家口市和察哈爾全省外，更重要的他還兼負平綏鐵路全線，從北平到

包頭這一條漫長地帶的工作。我在這一帶，不論黨、政、軍方面和地方上，都有相當良好的社會關係，因而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幫助和便利。我必須在這裏提到的是，那時中國，特別是華北所面臨的日益險惡的環境。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日亟，得寸進尺，步步緊迫。民國二十一年，它一面侵佔我錦州，一面在上海發動「二二八」事件，包藏禍心，陰謀莫測，迫使我中央政府遷至洛陽辦公，三月九日偽滿洲國宣告成立。民國二十二年，日寇又攻佔山海關，侵入承德，佔據熱河，並進攻華北，及誘脅內蒙各王公在百靈廟舉行自治會議，隨即設立區自治政府，實行高度自治，意圖脫離中央政府之統治。在此項醜惡行動中，察哈爾省錫林郭勒盟西蘇尼特旗親王德穆楚克敦魯普（簡稱德王），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能發生重要作用。日本關東軍和日本特務機關都了解這一點，而要積極的利用他。最顯明的事證，就是民國二十三年，他受了日本關東軍囑託（即顧問之意）于蘭齋（滿人）、陶克陶（蒙人）、金順卿（蒙人）等的慫恿、慫恿，而到偽滿洲國覲見了傀儡皇帝溥儀。隨即在百靈廟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進一步顯示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的態勢，也就是向日寇再靠攏了一步。

民國二十四年，德王在日寇的泡製下，組織「軍政府」（後改爲「內蒙古自治聯盟政府」），自任主席，吳鶴齡任政務院長，李守信任蒙古軍總司令。對於這一個傀儡組織，日本關東軍承

允在軍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等深受其迷惑，沉醉於日本人幫助蒙古人完成「自治」的美夢中，而不覺其醜惡。但是，他們在另一方面，也不願和我中央政府完全決絕，還想「留餘地，準備萬一」。因而就造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種微妙關係和特殊氣氛，正好給我們在工作上加以運用。

德王與吳、李二人，過去都和我有很好的友誼關係，而他們的左右，也有許多人是我的朋友，其中不乏明理篤義之士，既不直他們之所為，也深為他們的行險僥倖而擔憂，因此常和我討論這些事，使我對這一項「陰謀」，自始至終都明瞭其底細，而且我所主持的察省第一師範學校中，蒙旗師範班畢業的學生，已有許多人在德王和吳、李屬下任職，其中有幾位經我特加推荐，已經在政府中擔任了處長，這使我十分便利的，能以掌握到不少重要而具體的資料，得以向馬漢三同志不斷提供情報，並對他作詳盡深入的分析。不過，我的這些朋友和學生，當時還沒有阻止這一陰謀發展的實力，而我中央政府，也因當時的「特殊」環境，對此一陰謀活動不能壓制。在這種情勢下，只好把我蒙旗籍學生加以組織，使他們儘量「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等的圈子裏，掌握實職，形成力量，以深入的部署，作策反的準備。我之所以如此作為，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國熱忱和反日寇、反漢奸的大義，以及工作的責任感所驅使，但是當時有一些朋友，不明究竟，對我的作為不太諒解，責怪我為什麼要把優秀的蒙籍青年學生，推介到德王和李守信那裏去工作？這真

是「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我行我素，不足以為外人道了。

南京會晤戴先生

當時深知我的用心，並對我的作為加以鼓勵和贊助的，只有馬漢三同志和戴先生。而且為了增強我的勇氣，堅定我的志行，戴先生特於這一年（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專電馬漢三兄，邀我到南京去相晤。這就形成了我和戴先生的第一次晤見。

我直到如今，還記得很清楚，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到南京後下榻於中央飯店，當日下午即和戴先生在雞鵝巷五十三號相見。他給我的印象是：「威嚴而誠懇，剛毅而親切，對人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每一句話都能扣緊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對他發生一種真誠、正確、忠義的感覺，從內心裏覺得，既不願、也不能給他以反對或輕慢，毫不勉強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領導者。」

他對我的家庭、生活、工作、信仰，詢問得很中肯；對於德王與李守信方面的事，提出許多重要而深刻的問題，來和我研討；對於華北，特別是察綏蒙的局勢，也徵詢了我許多意見；我們談得十分坦誠、融洽而暢快，當然談到當時危疑震撼的華北之局勢，我們都有十分沉重的心情，然而在沉重中我們交流着內在的赤誠和血性，在彼此所產生的自信、互信和共信，沒有半點痕跡的建立了我們之間深厚的情感和道義。而這一份情感和道義，不被時間所沖淡，却是歷久而彌真

，使我至今還對他有深深的懷念和敬重。

當晚，我又參加了戴先生特為我而設的歡宴，同席有徐為彬、劉培初二同志作陪。飯後又和我懇談，言極中肯而意氣豪發，使我對他有熱忱充沛而永不疲困之感。翌日上午約我長談，對我今後的工作，作了重要而明確的決定，和堅實而有力的鼓舞，同時還熱情的留我在南京遊覽數日，我因本身所負的校務和黨務工作，不能在京久留，當即婉謝了他的盛意，並即向他辭行，說明下午就要離京，他送我至門前時，又問我還有什麼建議？我感念他的熱誠，遂即向他進言，希望中央軍校每期都能到邊疆地區招生，這是使中央的軍事政策和力量深入到邊區，而能生根發展的最有效的捷徑。為此他又和我立談了許久，表示接納我的建議，即向當局轉陳。我回到中央飯店不久，徐為彬同志就前來看我，說明是奉戴先生之命，給我送來車票和程儀二百元（那時從南京經津浦、北寧、平綏三線鐵路到察省張家口的頭等火車票約值三十餘元），並代表戴先生來送行。

從南京回來，我盡心竭力，逐步完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務，並協助馬漢三同志工作，這時的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甚為順利。

民國二十六年，參加了廬山暑期訓練團教育組受訓，編為第十四大隊，住在牯嶺傳習宿舍，胡宗南先生任大隊長，戴先生特別介紹我和胡先生認識，因而在受訓期間和胡先生作了幾次懇談，使我們也有了深深的革命契合。

不幸就在這時發生了「七七事變」，蘆溝橋

的炮火，震撼了中國人民的心弦，驚醒了中國的國魂，有血性的中國人，莫不奮志抗日，都想和侵略中國的日寇作戰，抗戰之聲像風起雲湧般的不可遏止。我恩惠的回到察省，想組織一些抗戰的實力，協助政府，保衛國家。然而時間太匆促了，敵勢既猛且速，八月二十三日張家口已經失守，我和馬漢三同志都到了綏遠，協同綏遠站站长史弘同志，仍從事策反偽蒙古軍的工作。

不久，綏遠也告淪陷，我即在偽蒙古軍總部的掩護下，進行工作。我們的工作雖可得到德王和李守信的同情與協助，然而在敵我形勢對比，我方顯然處於不利的情形下，想使他們正式易職舉義，反正來歸，那誠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彼此有相當的默契，他們以自我利益為中心，而與日寇虛與委蛇的情況，我們也十分的瞭解



本文作者立法委員張季春先生近影

，認為他們總不失為一部可資我們利用的力量。而且當敵我形勢扭轉時，他們必然會成為加重我方實力的一個分量不輕的籌碼。就在這一種默契下，我和他們相處得很融洽，我對我的工作和抗戰前途，也具有堅強的信心。

這年嚴冬來臨時，基於工作的需要，我到北平擔負一個工作組的責任。平津區的區長，先是毛萬里同志，後來由馬漢三同志擔任，周世光同志一直擔任書記。從這時到二十八年冬，雖然是在敵後日甚一日的險惡環境中，但是我們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績斐然，大家在樂觀奮鬥中，過着驚險緊張的生活。

收拾綏遠站危局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有漢奸向日本特務機關告密，日特發現了我方工作的線索，當時我得到日本特務機關內線的密告，從北平西城豐盛胡同的住宅中遷出，化名住進中央醫院，這時北平的工作處在緊急的危險信號之中，但是同志們還是勇敢而負責的不停的工作着。戴先生對此一情勢，非常關切，派喬家才同志前來視察和慰問，這是一項十分恰合時宜給同志們打氣的措施，在十分緊迫的險局中，他對同志們發生了鎮定的作用。在北平的整個組織，依然在相互隔離狀態下繼續活動。不久書記周世光同志不幸被捕，情況愈益緊迫，所有的同志都切斷了原有的聯絡關係，而重加調整部署，我也遷居到西郊海甸，用李化民的化名繼續工作，不過環境則

日益險惡。這年的十一月，新任區長劉藝舟同志到職未久，平津區的組織即被日寇偵破，血和淚再度的洗鍊了我們的組織，刺激了我們的工作，我奉派到天津站任站長，重新創建工作。但當我剛剛把天津方面的社會關係聯建了起來，把掩護身份安排妥當，正要去正式接收原來天津站一切關係點線時，戴先生又以緊急電令，叫我擔任綏遠站站長，我星夜趕往歸綏，挽救那裏的危局。因為那時劉建華同志（蒙籍名字是那木耳），擔任敵偽方面的綏遠市警察局長，他對綏遠站組織和工作活動，發生着重要的安全掩護作用，可是日寇却嚴令他捉拿我們前任綏遠站站長陳燁如同志，如捉拿不到，劉同志即受押辦，劉、陳二同志受了嚴重的威脅，奉令撤離轉至後方。我在這種情形下，前往收拾殘局，重振旗鼓。

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復原有組織，原有工作關係，在更為隱蔽的情形下，繼續發展工作；一面創建一個新的組織體系，和原有組織採取絕對隔離，別開蹊徑，展開工作，作第二線的必要佈置，此項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發展與績效。另外，則是更積極的進行我一貫持續的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工作，那時德王任偽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兼偽蒙軍第十八軍軍長，李守信任偽熱河省政府主席兼偽蒙軍第十九軍軍長，他們確有日在增長的力量，而加強了他們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當我正在戒慎恐懼，然而却是興緻勃勃的進行着這些充滿希望和有意義的工作之際，想不到竟有飛來橫禍降臨在我身上。因為在敵寇的嚴追緊索下，我們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作組織全

被日寇偵破，日本特務機關，以大批人力極盡其能事的，一面嚴加監視跟踪，一面盡力深入追索，終於波及到察省張家口，將站長楊金聲同志逮捕。楊同志以偽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長為掩護身份，他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保護色，他在毫無朕兆的情形下，猝不及防而被捕，這使我們的組織和工作受到慘重的損害。楊同志終於光榮的殉難，盡到了他最後的職責，然而這一場禍變的線索，在當時却立即延伸到綏遠。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綏遠站電台被敵破獲，我也於同日被捕，羈押於日本憲兵隊。當時日寇的特務機關憲兵隊和偽地方警察機關，都可以對中國人濫捕濫殺，沒有人敢加以干涉，也不受任何限制。那時被捕的人，先受酷刑拷打，然後任意處決，所以每一個被捕的人都自知必死，誰都不怕苦刑，不肯真實招供。直到汪偽政府成立後，西尾壽造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受汪偽政府之請，頒訂「軍律違反條例」，不准侵華日軍及偽政權機關濫殺中國人，一應「人犯」都須經過「軍律會審法庭」審判。因此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志，都被解送張家口日本駐蒙軍司令部，接受軍律會審法庭之審訊。

被敵共兩次逮捕

首先被判處死刑而遭難的是我們以偽蒙軍軍職為掩護的工作同志吳鈞玉（任偽參謀處長）、李錦章（任偽團長）等四人；繼而我張家口站站長楊金聲、綏遠站人員劉長榮、大同組組長張存仁、趙維城等六同志也被判死刑而槍決，隨後我

和另十五位同志都被判處徒刑，其中我被判十五年刑期為最重，即送張家口監獄服刑。在獄中先四年帶腳鍊，服苦役，其後除鍊到工廠做工，直至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日寇投降，八月二十三日始獲出獄，然因交通阻絕，只得留居張家口，詎料九月間張家口又為當時的「八路軍」佔領，我復被捕，據宗不風同志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間告我，戴先生對我兩次被捕，都十分著急，曾指令有關人員不惜任何代價，要把我和被日寇逮捕的天津站長曾轍同志營救脫險。

民國三十四年冬，戴先生駐節北平，特宴請家駁子元公及內子，渥予慰問，並將自我被日寇逮捕迄於當月之薪金，一次補送，復懇切聲言，絕以全力救我脫險，已令軍事調處執行部我方代表鄭介民先生，向中共代表交涉釋放。同時，我「察哈爾旅平復員協進會」也向政治協商會議共黨代表團進行交涉，早日釋我。三十五年四月，我幸獲自由，經北平南下赴京，而戴先生已於三月十七日殉職，內心的哀傷、懷念和感謝，只有到他靈前，用心聲和眼淚來表達。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接奉行政院蔣兼院長介公從壹字第一一一一六號褒揚令，內稱

「查張季春組織抗敵團體，爭取青年愛國思想，指導地下工作，秘密聯絡蒙籍要員，令其相機反正，打擊敵寇，頗著功績。為人深明大義，守正不阿，兩次被捕，堅貞不屈，足資矜式，應予明令褒獎，以資表彰。此令！」

同年八月又蒙國民政府頒授六等雲麾及勝利

勳章。

當我奉到上項褒揚令和勳章時，在悲喜交集的心情中，益發激起我對戴先生的懷念。

我和戴先生沒有半點私人關係，完全是在革命救國的戰鬥中相契合，他是我滿心崇敬的長官、敬愛的同志、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以這三種複合的情誼，對他產生深深的懷念，直到如今，及於久遠。我確信他是一位使人在有血有淚、有情義、有思想的歷史回憶和現實生活中，一直紀念不忘的偉人。

戴先生殉職三十一年了，國家和我個人在這些年來，都充滿了哀傷和創痛，然而時間愈久，愈覺得他光輝親切，存在我心中的影子，愈為明顯。撫今追昔，不勝慨嘆！謹以此文憶往，並表達我對他誠摯的崇念。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文稿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